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马克思归来

下

[瑞典] 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加] 莫斯科 (Vincent Mosco)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校

Marx is Bac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马克思归来 ②

[瑞典] 福克斯、[加] 莫斯可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校

Marx is Bac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归来/(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75-4013-2

I. ①马… II. ①福… ②莫… ③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传播学—
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1643 号



Marx is Back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719 号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马克思归来

编 者 (瑞典)福克斯 (加)莫斯可

译 校 者 “传播驿站”工作坊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0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013-2/A·005

定 价 138.00 元(全二册)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赵月枝) 1
导论:马克思归来	1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27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	65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92
反商品化	116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149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	168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196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238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283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332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350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389
------------------------------------	-----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418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499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535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556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579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	611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642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 2.0”: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665
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698

第四篇 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	717
21 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	754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787
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	814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830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	870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	905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931
------------------------------------	-----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蔡蕙如(译),吴畅畅(校)

[导读]在本文发表前,有关网络的“批判”研究或“批判”网络的研究非常多,但是本文诚属第一篇系统性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厘清所有相关“批判的”网络研究对批判认识的不足,意即没有正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研究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对目前从事或准备投入批判网络研究的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网络普及程度与变化程度甚快(例:速度、形式-网页、部落客、社交媒体),一直以来,比较多的批判性研究着重关注某些问题现象,并且经验性地诠释“新现象”的意涵,这反映在本文所提及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何谓批判”和“从规范的程序来理解批判”两种长久以来辩论中。就我的理解,即使前者的“批判网络研究”解释了经验层次上的某些看似不平等或解放的现象,但根本上缺乏宰制结构的系统性分析,所以在研究过程其立论是:潜在(或无意识地)肯定主流因特网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即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核心概念:阶级、剩余价值、剥削、

^①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信息与媒体系媒体与传播研究的讲座教授。他也是统合理论信息研究小组(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的委员会成员和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认知、沟通、合作)的编辑;一本为了全球永续信息社会的期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批判理论、媒体政治经济学、ICTs(传播、信息、科技)、批判信息社会研究、ICTs 和社会。它同时也是许多出版品的作者,包括《网络与社会:在信息时代下的社会理论》(New York: Routledge 2008)和《批判媒体与信息研究的基础》(New York: Routledge 2011)。他是 ICTs 和社会网络的创办人之一,也是欧洲社会学协会的研究网络 18-传播与媒体研究的社会学的主席。christian.fuchs@im.uu.se, <http://fuchs.uti.at>

商品化等。所以很轻易地,我们只看到研究问题的表面,而无法提出根本的问题(或解答)。我认为在网络研究里,尤其容易遇到这种状况,这是因为我们在做网络研究时,将其场域特殊化之故。此外,本文的分析与厘清,对我们理解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和关于网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之间所体现的“批判”背后指涉的意涵,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批判的网络研究,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网络批判理论,批判的网络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马克思回来了

一、导 论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活中,网络已成为一个形塑当代资本主义生活,并同时被形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技术体系(socio-technical system)。网络研究也成为用来思考社会、个人独特性、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的重要领域(Fuchs, 2008)。

有些学者从住房与财经危机探讨第三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这也再度燃起各领域兴趣,将其自身贴上明显的批判以及反资本主义者的标签(Harvey, 2010; Žižek 2009, 2010b),为了反映出网络研究取径,往自身贴上再清晰也不过的批判标签的这种状态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此,本文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批判的网络研究取径的概述,指出此领域的重要概念,并且体现批判网络研究的批评。本文的讨论分为几个部分:回到马克思(第二节)、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第三节)、批判政治经济学/网络批判理论(第四节)、这两种取径的比较(第五节)、批判网络研究概念的探讨(第六节)、批判网络研究的批评(第七节),最后为结论(第八节)。

二、马克思回来了

伊格尔顿(Eagleton, 2011)认为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像马克思一样遭受如此扭曲,并在其著作核心呈现出与一般对马克思的偏见完全相反的态度。齐泽克(Žižek, 2010b)认为,最近的经济危机导致研究马克思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再次兴起。这也展现在主流媒体对于马克思的关注。例如《时代》杂志曾以马克思做封面人物,并提问:马克思会怎么思考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2月2日《时代》杂志)霍布斯鲍姆(Hobsbawm, 2011, 12f)认为,我们“必须问马克思式的问题”(13)才能理解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以及现存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议题。他也相信:“无论是单一或结合运用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都已无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是时候来严肃看待马克思了!”(Hobsbawm 2011, 419)

如同德里达(Derrida, 1994)所提到的一个笑话:就算人们没怎么指望马克思主义,但对各种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像是不断纠缠资本主义的幽灵,时刻都准备归来。苏联解体后,这种自相矛盾持续了将近20年,资本主义似乎已加剧全球性的问题,导致贫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果,并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形式重返,以及随之而来的是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马克思已死,资本主义长存的论调喋喋不休一再反复,但如今马克思已再度归来。

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时,马克思著作有六大面向尤其攸关:

- 对于许多社会理论家而言,资本主义全球化似乎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例:Callinicos 2003)。这个主题也链接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团结作为反抗形式的命题,在今日则以另类全球化运动(the altermondialiste movement)^①实践之。

- 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于机械、传播的意义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概念时,早就预料科技、知识和媒体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例:Dyer-Witheford 1999; Fuchs 2008, 2011; Hardt and Negri 2004; McChesney 2007)。

- 由于新自由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immizerization),这意味着需要再度关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阶级概念(例:Harvey 2005)。

- “9·11”后的全球反恐战的暴力和镇压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与监控强化,导致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再度受到关注(例:Fuchs 2011, chapter 5; Hardt and Negri 2000; Harvey 2003)。

- 生态危机的出现,再度实现马克思著作的核心:一个介于现代工业主义和自然之间的对抗,以及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例:O'Connor 1998)。

^① the altermondialisme movement 在此译为另类全球化运动。altermondialisme 为法文,翻译为英文则是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alter-globalization)。对立干全球化(globalization),另类全球化运动强调的是全球性的合作与互助行动,并且反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反对环境破坏、反对跨国性的劳工剥削、反对侵害人权等议题。——译者注

• 新全球经济危机在 2008 年的出现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至今仍相当重要(Foster and Magdoff 2009),资本主义本质上似乎就是充满危机的。

齐泽克认为这些在生态危机、知识产权、生物遗传学、新形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等这些脉络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抗,显示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有一种“看似可疑又太过简单的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Žižek 2008,6),承诺一些理想却不可能实现的修辞。例如:参与、自我组织、共同合作,这种标示软性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让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开始,并捍卫其失落的事业。泰尔朋(Therborn)认为,在 21 世纪有“一系列新的力量和反抗的可能性需要保留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使人们从剥削、压迫、歧视,和无可避免的特权和苦难之间的联系中解放出来”(Therborn 2008,61)。杰姆逊(Jameson)相信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和灾难来得正是时候”,并从全球失业率来看“马克思如同资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Jameson 2011,1),其所创造的《资本论》第一卷(Marx 1867)就是一本最为实时的书。

网络研究必须具体关注资本主义如何形塑网络,又如何被网络所形塑的分析才有意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反思网络研究,并重新调整成网络的政治经济和批判理论的批判,顾及媒体、科技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特质,即分析“资本主义结构如何形塑媒体(McChesney 2007,79),社会关系结构里的传播角色和……特别受到关注的社会权力,就是为了分析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里的角色”(Garnham 1990,7),以及媒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分析(Knoche 2005,105)。

在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媒体、传播和文化的批判分析如同新物质般改变持续前进的资本主义。20 世纪早期的取径,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包括像是葛兰西(Gramsci)、卢卡奇(Lukács)、柯尔施(Korsch)。后两位思想家影响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Kellner,1989)。葛兰西对英国文化研究有重要影响(Turner 2003)。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有很多相异之处,但都对意识形态批判有共同兴趣。像阿多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马尔库塞(Marcuse)、本雅明(Benjamin)、威廉姆斯(Williams)或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都对马克思的作品有很深刻的认识与兴趣。文化研究也受到阿尔都塞(Althusser)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Turner 2003)。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已受到批判政治经济学派的挑

战,譬如斯迈思(Smyth)和加汉姆(Garnham)曾强调媒体的经济功能,或像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席勒(Schiller)、戈尔丁(Golding)、默多克(Murdock)、赫曼(Herman)、乔姆斯基(Chomsky)、麦克切斯尼(McChesney)都承认媒体经济批判的重要性,但也持续地强调媒体作为生产者的意识形态的角色(Mosco, 2009)。文化与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近来有更多的发展,例如在研究取径上整合不同的方法(例:Kellner 1995);另类媒体理论或多或少来自安成思伯格(Enzensberger)批判理论的观点(例:Downing 2001);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①出现的重要性(请见 Virno and Hardt 2006)。因此,网络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的历史。

批判的网络研究受到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媒体理论的影响,例如意识形态批判(请看 Lovink and Schultz[1997]在 Net Critique 里的例子),自主论马克思主义(Dyer-Witheford 1998; Fuchs 2008; Hakken 2003),批判政治经济学(Andrejevic 2007, 2009; Fuchs 2009b, 2010, 2011; Hakken 2003)或批判理论(Andrejevic 2009; Fuchs 2008, 2011; Taylor 2009)。

三、网络文化研究的批判与非批判(un-/critical)

我们可以区别两种自认为批判的因特网研究取径。一是文化研究的背景,二是政治经济学背景。第一个理论背景,在广义的条件下算是后结构主义者,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者。

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定位明确,像是在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应用(Bell 2001, 65—91; Jones 2006, xv-xvi; Sterne 2006)。贝尔(David Bell 2006b)在其四册合集的《网络文化》(Cyber Cultures)导论中提及 18 个影响网络文化研究的媒体与文化研究的批判概念。其中包括:文化研究、科技哲学、女性主义研究和政策研究,而另一些像是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或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则明显缺席。在这四大册一共 1600 页的书中、以及贝尔所汇编的所有标题中,只能找到一个网络研究的批判概念,读完这 69 章后,一个最令人感到纳闷的问题是:为什么批判面向的概念消失了?剥削、剩余价值和阶级等概念在因特网变成边缘议题,然而一些像是因

^①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也可简称为自主主义(Autonomism),这是意大利从 1960 年代开始,从工人主义的运动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译者注

特网的历史、研究方法、虚拟社区、在线认同、网络空间的身心状态、网络人(cyborgs)等概念都被明确地呈现出来。温斯克(Dwanye Winseck)、罗宾斯(Kevin Robins)/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或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等人对网络资本主义与剥削的探讨有所贡献,但却在此书中被边缘化。该书辜负了贝尔自己在导论中的承诺,以及他自定义的副标题:“批判概念”。

斯维尔(David Sliver 2006b)强调“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是网络文化研究的第三阶段,出现在流行的网络文化研究和网络文化研究之后。他认为批判网络文化研究为:

- (1) 探索“在线发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互动”(Sliver 2006b,67)
- (2) 网络空间的论述分析
- (3) 网络近用分析
- (4) 关注参与式设计(Sliver 2006b,67—73)

斯维尔提倡一种浅显的批判概念。第一个性质较为广泛,大多数因特网的分析聚焦在社会、文化或经济议题上(政治与环境的分析除外),因此尚未厘清“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应该特别去批判哪些范围。探讨“在线边缘化”(online marginality)的研究时,斯维尔强调种族、性别议题的重要性(Silver 2006b,70),但却未提阶级。

斯维尔和马莎纳利(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2006)呈现他们所收集的25份批判网络文化研究的读物。斯维尔(Sliver 2006a,6f)在导论中提及资本主义是批判网络文化的脉络之一,但他却较少关注“种族、性别、年龄和残疾”的文化差异(Silver 2006a,8)。这也显示对网络的阶级、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分析在此书仍属边缘议题,而网络空间文化差异的议题却占优势位置。

四、网络研究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

批判的网络研究的第二个典型取径是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以下针对这些取径的优先级,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非反应其评价好坏。下列取向所使用的语汇,堪称独具意义,都是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用以突显本身属性的术语。

罗文克和舒茨(Geert Lovink and Pit Schultz 1997)认为,“网络批判”(Net Critique)分析非物质领域的组织力量,也分析了网络帝国主义和意识

形态。“网络批判”的目标是自由近用所有媒体和所有内容。不过,“网络批判”不只是理论,而是理论-实践的结合,在数量激增的电子公众中,它代表的是激进的批判立场。自从《寻找网络批判》(*Call for Net Critique*)于1997年出版后,各种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跟着网络批判取径(the Net Critique Approach)出现(例:Lovink 2002; Lovink and Scholz 2005; Lovink and Zehle 2005; Jacobs, Janssen and Pasquinelli 2007; Lovink and Rossiter 2007; Rossiter 2006),更多在最近出现的还包括对 Web 2.0 的批判(例:Lovink 2008; Lovink and Niederer 2008; Rossiter 2006)。罗文克和其他人认为,“网络批判”取径不只是具有系统性的批判理论,而是一种批判的实践形式,因此必然和媒体行动主义与媒介艺术息息相关。

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 1999)建议我们在分析 21 世纪的科技资本主义时,应重塑马克思主义,并提出网络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迪尔-维斯福特在网络研究运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的取向,并呈现内格里(Antonio Negri)、哈特(Michael Hardt)、维尔诺(Paolo Virno)、拉札雷托(Maurizio Lazaratto)等学者的论述。在迪尔-维斯福特看来,自主论网络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Cyber-Marxism)与下列三者都不同,既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科技决定论、亦不同于新卢尔德主义^①的布雷弗曼^②式科技宰治理论^③,同时也迥异于后福特主义^④理论化科技陶

① 卢尔德主义(Luddism)此词源自 19 世纪英国手工业者因当时纺织工业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而逐渐机械化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机器并非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取代了他们的劳动力而导致失业。故当时英国各地发生多起捣毁纺织机器的事件。霍布斯邦认为,砸毁机器是一种对雇主和外包制生产中间人施压的通常手段。特别是工人所关心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而是现实上一组关系密切的问题,即预防失业与维持惯常习俗的生活水平,这包括非金钱的因素,像是自由与尊严,也包括了工资。(霍布斯邦,蔡宜刚译,页 17、25)新卢尔德主义(Neo-Luddism)源自卢尔德主义原本的意涵,延伸这种反对机械化、反对自动化的观点来响应当代科技的论述,包括对网络科技、基因科技、纳米科技、信息科技等的批判。美国学者 C. Glendinning 于 1990 年发表《新卢尔德宣言笔记》(Notes toward a Neo-luddite Manifesto)。——译者注

②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 1920—1976)为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曾于 1937 参与美国托洛斯基主义运动,并且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其知名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4)一书批探泰勒主义,描绘当代的工作特质转变是由资本家将劳工“去技术化”的过程。——译者注

③ the neo-Luddism of the Braverman-inspired technology-as-domination theories 译为“新卢尔德主义的布雷弗曼式科技宰治理论”。——译者注

④ 福特主义(Fordism)强调的是早期工业化的特征:透过工人从是低技术且重复性高的工作,进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消费体制。到资本主义晚期受到全球化影响,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特征则因为企业为或取更高利润而改变生产模式:弹性生产、弹性消费。——译者注

醉^①(Dyer-Witheford 1999, 38—61)。

埃玛(Greg Elmer 2002)看见三种批判网络研究的特质:

- (1) 驳斥且质疑那些宣称网络具有革命性的意识形态。
- (2) 分析网络财团化和门户化(portalization)的过程(Elmer, 2002, x)。
- (3) 关注基进的批判网络社群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这些宰制形式裂缝中刻画网络的本质。

哈肯(David Hakken 2003)主张一种奠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知识理论。他看见网络空间正形成一种“巨大的矛盾”(Hakken, 2003, 393)。新信息和新传播科技最好“视为抗争之地,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力量。科技是政治的,但不像所有政治,它们反而显示出多重矛盾的倾向”(Hakken, 2003, 366)。

福克斯(Fuchs 2008, 2009a, b; 2010a, b; 2011)认为批判网络理论/研究和网络的政治经济批判奠基在一种更为普遍的取径上,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批判都是批判媒介与信息研究的根基(Fuchs 2011)。因此他就网络批判分析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础,这些根基是:

- (1) 一般社会理论层次
- (2) 资本主义的分析
- (3) 媒体、科技和传播的批判分析
- (4) 网络批判调查的特定分析具有突发的特质

福克斯定义批判网络理论/研究和网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径:“它定义并分析网络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它展现了网络如何形塑竞争与合作的冲突力量,并同时彼此所形塑;侧重于网络如何结构化宰制与剥削,并同时被宰制与剥削所结构化,阶级形式和潜在阶级斗争如何以科技为中介。它确立以网络为后盾的社会发展和基进问题结构的潜力,以抑止为了共同合作、自决、参与、快乐和自我管理的人类和社会的潜能。”(Fuchs 2009b, 75) 福克斯(2011)将这个取径定义为一个奠基于批判理论、经验研究和以实践为导向的批判道德的哲学根基。

对安卓耶维克(Mark Andrejevic 2009)而言,所谓的“批判媒体研究 2.0”

^① the techno-euphoria of many theorizations of post-Fordism 译为“福特主义理论化科技陶醉”。——译者注

挑战当前过度欢庆媒体具有赋权与民主化特质而不加批判的状况,反而提出新媒体如何嵌入旧有形式的宰制。“因此,当涉及参与式媒体的革命承诺,批判媒体研究 2.0 的支持者和实践者面对挑战并不再宣称(在所有相似的修辞里)‘所有事物都已变了’,而需要解释为什么变了?即使面对最戏剧化科技发展,基本的社会关系仍然不变。说穿了,批判媒体研究无意就媒体关注媒体,而是为社会而关注媒体”(Andrejevic 2009,35)。安卓耶维克的取向是其中一种。泰勒(Paul A. Taylor 2009)认为批判理论 2.0 是为了“描绘传统批判理论 1.0 的关键观点,在基础上仍未改变”(Taylor 2009,93),是挑战 Web 2.0 乐观论的必需品。

这些取向主要的差异来自他们对理论的理解、经验研究所赋予的角色、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例:质性访谈、量化调查、内容分析、统计分析、批判话语分析、或民族志)。例如迪尔-维斯福特的网络马克思主义取径,在网络空间重建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方法。“网络批判”讨论案例时,不是阿多诺的(Adorno)阐述的多面向方法(prismatic method of exposition),而是来自于批判地反省理论所启发的立场。因此,“网络批判”会是刻意地折中,有时夹杂个人的或新闻体的性质,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整体。一方面,福克斯的取向来自更有体系的黑格尔辩证哲学,其中,各个类目在理论系统都有清楚位置,是所有类目则从抽象到具体层次的辩证发展。另一方面,他将辩证哲学运用于具体层次,借此经验研究才能奠定其基础。

网络的“批判理论”或“批判政治经济学”只是共主,其下各取径间存在着理论、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大量差异,不过之间仍有共通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共通点是它们对批判的规范性理解。因此,批判的网络学者反省由来已久的辩论,一方是把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批判,另一方是从规范的程序来理解批判。早在 1961 年,德国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辩论,就是以此作为核心。波普尔(Karl R. Popper 1962)认为以检验问题解答的方法来获取并且辨别知识的社会构成是一种批判方法,因为研究者以质疑其他人的作品的试错过程来改进知识。对波普尔而言,批判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法,可以展现逻辑的矛盾。阿多诺(1962)则与波普尔不同,他认为相互矛盾不仅是认识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同时也在对象(客体)内本身,使他们无法透过获得新知识来解决(Adorno 1962,551)。阿多诺强调,波普尔理想中的价值中立的学术界是一种被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所塑造的交换价值(Adorno 1962,560)。他认为实证主义以表象作为唯一判准,但批判理论则强调本质

和现象之间的差异(Adorno 1969, 291), 并指出波普尔那种主观认知的批判概念(Adorno 1969, 304)。这是认识论批判(波普尔)和社会批判(阿多诺)之间的基本差异。批判的网络学者质疑, 通过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网络, 并没有植根于彻底的社会分析, 也没有植根于社会的批判理论。这批质疑者当中, 有些人则质疑所有经验研究, 因为他们认为, 支配的谬误是一种规范看法, 无法证实检验, 仅能通过论点辨明。阿多诺聚焦于社会的批判, 他们无不共享这个价值。

第二个批判的网络研究取径之特征是, 它们都认为, 这个领域的传统网络研究, 充斥着工具和科技理性, 其功能在于合理化且复制资本主义, 并将资本主义内部的其他支配形式, 一并合理化了。工具理性意味着“观念变得工具化且自动存有”, 观念不再是“有自己意义的思考”。观念变成只是物, 只是为了达到复制和深化支配的机器(Horkheimer 1974/ 1947, 15)。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另一种说法, 强调的是“思考的元素, 它调整思考的规则, 使适应于控制和支配的规则”(Marcuse 1964b, 138)。技术理性认为, 当前的现实之外, 别无其他现实。它的目的在于“消灭反对的元素, 也消灭超越的元素”(Marcuse 1964, 56)。科技理性造成单面向思考, 此时, “任何观念、任何愿望与任何目标, 只要其内涵超越了既定的言说与行动范畴, 就会被摒弃, 或是被化约为这个范畴而遭吸纳”(Marcuse 1964, 12)。批判的网络学者认为, 主流的网络研究是一种意识形态, 因为他们分析网络时, 并未将其分析嵌入支配结构的分析, 他们也欠缺信念, 未曾介入斗争, 未曾想要追求更美好的世界, 并且消灭支配。

第三种共通性涉及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所有批判的网络研究取径之所以从事批判, 是要批判剥削、宰制、权力的行使、结构暴力等等现象, 从中促进实践, 解放人类, 使其不受上述现象的压制。贝卡吉瓦(Maria Bakardjieva 2010, 61)认为, 相较于统计和诠释的取径, 批判的网络研究其旨不仅探索网络在培力、压迫、解放、异化和剥削等方面的角色, 并且还有针对这些具有规范意义的问题, 提出答案。批判研究不仅分析网络的宰制, 也分析网络的解放。这类取向或多或少都在明确指向, 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 如草根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参与式民主、永续发展的信息社会等概念。这类取径认定, 这个规范的面向就是它们所独具的解放特质。

批判规范面向是批判网络研究的主要特质, 它所传达的是霍克海默的洞见, 他说, 批判理论是为了迈向“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Horkhei-

mer 1937/2002,241)。霍克海默的文章《批判理论与传统》(*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传达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建马克思理论,就是重建社会批判理论。

因此,可以说批判网络研究不仅仅受惠于法兰克福学派所理解的批判,甚至,这一理解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总结了规范向度,掌握了“事物的根基”,并奠基于“人是人最高的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终结这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MEW Vol. 1,385)。① 如果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是对所有宰制形式和霸权关系的批判,那么所有批判研究都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所启发。在我看来,我们不应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反之,我们应该严肃且积极地肯认。

批判的网络研究既有规范面向无法在真空中运作。反之,它强调的是,我们得提出规范,据此批判宰制,目标则是走向解放;这个重点在更为普遍的层次,又与媒体、传播、科技、文化和信息的许多分析取向有关,如果它们也都认同这个规范。就此来说,批判的网络研究与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批判信息系统研究等等分析又格外有关。批判的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②,研究的是“权力关系,如何制约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消费之相互构成”(Mosco 2009,2)。这个取径所要处理的课题是:“媒体系统如何”与“权力在社会的全面配置”互动,并对其产生影响(McChesney 2007,77);这个取向提出的是:“正义、公平和公共之善等基本伦理问题”(Murdock and Golding 2005,61)。媒体与科技的批判理论应该分析的是:“社会有哪些支配与反抗的形式,同时要能批判宰制的存在,批判媒体文化所复制的支配与压迫关系”(Kellner 1995,4)。这个取向“所遵循的是,对支配的批判,以及解放的理论”(Kellner 1989,1;另参见 Feenberg 2002)。批判的信息系统研究所要产出的“知识,是要揭示和解释信息系统如何被误用或使用,致使信息系统被用以强化控制、支配和压制;与此同时,它还要指认并

①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卷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245—404页。——译者注

② 这些取径的代表,像是尼古拉斯·加纳姆、彼得·戈尔丁、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或默多克,若将之称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则是一个误解,因为政治经济学不一定像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1867)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批判。马克思强调,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系统化了资本主义以“迂腐的方式”宣传资本主义和它“永恒的真理”的成份(Marx 1867,174f)。由于这些方法通常以英美为背景讨论“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并通常不去自然化且盲目崇拜媒体与传播作为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我们称作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批判是较为适合的。

启发具有转化作用的社会实践,使信息系统能够实现解放潜能”(Cecez-Kecmanovic 2005,19)。它的任务是分析信息系统的角色,辨明其剥夺权利与赋予权利的性质,从而协助“克服不公正与异化的问题”(Stahl 2008,9)。

五、批判网络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与网络的批判理论

各种批判的网络研究有一个主要差异,展现在“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以及“网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野。前者着重的议题是网络身份的边缘化,后者的议题则聚焦在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

阅读“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的书籍时,我们应该将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的观点放在心上。他说:“种族支配的现代形式,其基础是经济宰制”以及“各种父权制形式也是其来有自,深刻镶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切割,一方是家务经济,另一方是薪资劳动与资本形成的场所”(Garnham 1998,610)。批判政治经济学“认为,阶级,亦即生产工具的使用结构以及经济剩余的分配结构,是决定支配结构的关键;文化研究则认为,性别、种族,以及其他标志差异的潜在项目,才是决定支配的其他结构因素,不是阶级”(Garnham 1998,609)。在“批判的网络研究”里,相似的差异同样存在。“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取径倾向认为,网络空间的性别和种族不必然受阶级塑造。在它看来,阶级并不是理解网络宰制的关键,虽说这个宰制对性别、种族和其他差异,已有关键性的影响。它流于忽略阶级、资本主义和剥削等议题。因此带有些后现代色彩的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若要用来解释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网络和传播角色并不合适。危机本身证明了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核心角色,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经济阶级的批判分析,理当是“批判的网络研究”之核心议题。

在一场拉克劳(Ernesto Laclau)、巴特勒(Judith Butler)与齐泽克(Slavo Žižek)的三方会谈中,他们认为后现代取径本身是一种常见的语言游戏,“将‘阶级’转换并列于其他概念‘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其中一种”(Butler, Laclau and Žižek 2000,297),为了强调“阶级”不重要,还刻意将“阶级”置于所有概念中的最后一个位置。拉克劳称之“解构的阶级”(deconstructing classes)(Butler, Laclau and Žižek 2000,296)。我认为在此脉络中,齐泽克毫无疑问地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假设“不可化约的各种斗争”是一种接纳了“资本主义已是‘世界上唯一的竞争’(the only game in